

沟口雄三著作集

沟口雄三  
著  
中国的冲击

王瑞根译 孙歌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沟口雄三著作集 孙歌 主编

王瑞根 译 孙歌 校

沟口雄三 著  
中国的冲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Chugoku no Shogeki

Copyright © 2004 by Yuzo Mizoguchi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冲击 / (日) 沟口雄三著; 王瑞根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7

(沟口雄三著作集)

ISBN 978-7-108-03623-0

I. ①中… II. ①沟… ②王… III. ①中日关系—文集

IV. ①D822.33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3851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7月北京第1版

201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8.875

字 数 176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35.00元

## 序论 中国的冲击

### 第二次冲击

我在此使用“中国的冲击”这一标题，是因为我把鸦片战争以来的所谓“西方的冲击”作为一个潜在的问题。尽管如此，我却绝非单纯地想要表明“中国的冲击”将要取代昔日的“西方的冲击”。不过，作为许多人的共识，我们日本人历来是从正面将“西方的冲击”当作一种冲击来接受的；我们推进了名为“文明开化”的“西欧化”并如此走到了今天。我使用“中国的冲击”一词含有这样一个意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从日本人的角度出发、“从东亚的内部”来重新审视那“来自外部”的冲击的意义。

在最近这几年里，我们持续推进了一个名为“日中·知识共同体”<sup>〔1〕</sup>的活动。我们从中充分地认识到了

---

〔1〕 “日中·知识共同体”是1997年至2003年间日中两国知识（转下页）

知性跨越国界的难度。尽管积累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在选定 2001 年 1 月北京会议的主题时，我们还是感到措手不及——针对我们日本的参与者提出的关于讨论日中间历史认识问题的建议，中国的参与者却把中国内陆的“三农”问题当作迫在眉睫的国际问题进行了提议。这让我们非常意外。尽管我们出于关注现在和未来胜于回顾过去

---

(接上页) 分子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所进行的长达 6 年的知性的交流运动。以下是拙文《“日中·知识共同体”的轨迹》的摘录（原载《亚洲中心新闻》2002 年第 22 期，国际交流基金亚洲中心发行）：

参加者皆是负有强烈责任感、不满足于一般的知识积累、苦心于如何理性地审视本国问题、勇于自觉地肩负知性本应承担的社会性历史性责任的知识分子。

正是这样一些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不狭隘地拘泥于本国一国的利益和逻辑、依赖于理性而非感情，共同创造了一个具有宽广的视野、能够理性地自我批判的平台。

若要深化对问题的认识、拓宽共有空间，唯有在知性的层面上深化主体的思维方式、扩大对主体的责任的自觉性。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共同探讨诸如日中两国国民之间存在的感情上的龃龉之类的沉重问题。为此，必须始终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自身应有的状态、迫使自己要有紧张感。这一运动最大的关注点在于：不使“共同体”成为常见的评论家之间轻松愉快的联谊以及知识的交换、或针对个别问题的实践活动，而是探讨如何依靠知性积极参与现实，逼近问题的深层。

这一运动的另一特点是：中国的《读书》杂志、日本的《世界》和《现代思想》杂志的编辑们也加入到了参加者行列里来了，参加者的言论也不时被这些杂志登载从而得以在读者中传播。《读书》的发行量据说当时有 12 万册，是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最受欢迎的杂志之一。据说，在这场运动产生以前，该杂志很少登载日本人的文章，也极少探讨日本问题。尤其是在此前的中国知识界里，日本知识界有关战争问题的思考几乎是闻所未闻。而此运动开展以后，我们有关战争问题的讨论也以《读书》专题等形式（转下页）

的考虑接受了他们的提案，但还是心存疑窦。“日中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作为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我们以为对于认真思考日中关系问题的日本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而我们却感到：与对“不谢罪的日本人”心存芥蒂的中国国民的一般情绪相异的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历史认识问题”并非一个重要的课题。我察觉到，历史认识问题在他们看来与其说是一个

---

(接上页) 得以在中国发表，随后还发表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教授们对这些讨论作出回应的论文等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尤其是“天安门事件”之后，日本的知识界里存在着一种自以为是的认识：中国没有言论自由。通过这场运动，这种偏见得到了更正。大家也开始认识到对中国作“体制内”与“体制外”划分，原本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实际上，参加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来日本的时候，在日本知识分子面前，都展示出自由地提出问题、深入思索、以宽广的视野分析问题的姿态。他们还屡屡在《世界》和《现代思想》杂志上亮相，以崭新的问题意识使日本的读者为之倾倒。运动还使我们认识到了不能把自由仅仅当作一个观念，还应作为一个流动着的运动体加以把握。

使这一运动得以成立的两国的知识状况，最初并不是很顺畅的。来自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人士几乎都是曾在欧美留过学的人，因而他们的目光总是盯着欧美。他们是否关注作为第三世界的亚洲姑且不论，但把亚洲作为一个地域加以考察的意识都是极为淡薄的。在他们的观念里，作为一个地域的亚洲，除了印度之外，简而言之不过是周边的一个小国群，那里并不存在如同欧洲存在的那种思想资源。明治以来日本具有绵延不断地关注亚洲的传统。相比之下，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关注亚洲的意识则显得很淡薄。这首先说明两国在知性的定位上潜藏着鸿沟。

此类鸿沟在第一次活动时就显露了出来。从跨越了鸿沟的第一次活动以来的6年里，我们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真实地感受到了日本的知识界里也存在着根底良好的知识分子，日本也存在（转下页）

需要互相讨论的问题，或许还不如说仅仅是一个“你们日本人”的道义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三农”问题在他们那里被视为全球性问题之一，犹如地球人口、难民问题或亚洲的“南北问题”等等。从这一定位的角度来看，日中间的历史认识问题的确只是一个局部性问题，作为研究课题其“优先权”也是不高的。韩国知识分子在日韩间历史认识问题上所显示的与日本程度一致的关注在中国是看不到的。

显然，在日中两国的知识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在日韩之间看不到的断层。对于我来说，这种断层的存在是出乎意料的。然而，更为严重的事情是，大多数日本人还未能察觉到这种断层所隐含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容待后叙。

日本人在谈到近代以后的西欧化时，“脱亚入欧”是常会浮现脑海的词语之一吧。在说到脱离亚洲时的“亚洲”不是一个地理性概念，而是一个文明意义上的概念。具体而言，它指的是中华文明圈。那意思是说脱离中华文明圈而进入西欧文明圈。不过，那并非单纯地从A转移到B的意思，而是意味着从落后了的文明转向先

---

（接上页）思想资源，向他们提供了通过关注日本和亚洲、准确地说以日本和亚洲为媒介思考中国自身和世界问题的思维理路。当然，对日本方面来说也是一样。中国知识界的存在也给日本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样，我们成功地在日中两国的知识界之间架起了一座小小的桥梁。现在已渐渐地扩展到包括中国的台湾、香港乃至韩国在内的东亚地区。

进的文明。显然，它是伴随着价值优劣的判断的。

福泽谕吉写有一篇名为《脱亚论》的著名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是用“亚洲的顽固不化”、“古风旧习”、“儒教主义”、“阴阳五行”、“仁义礼智”、“虚饰的外表”、“残酷而无廉耻”、“自闭于一室”、“陈腐的专制”、“无法的国度”等等辞藻来形容日本应该脱离的亚洲的。虽然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些辞藻的使用是当时朝鲜国内的改革派遇到挫折的状况的反映，它包含了福泽谕吉对那种状况的焦躁；但是，诸如此类的“亚洲论”在日本、尤其是在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译者注）以后普及开来，渗透到了一般的民众层面。

问题在于：虽然从那时以来，随着战前的所谓大东亚构想、兴亚主义、亚洲主义的出现以及战后亚洲各民族的独立、从社会主义革命到亚洲新兴工业经济区（即亚洲四小龙）的兴起等等，情况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然而，在已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脱亚入欧观这一划分价值优劣的思维框架依然根深蒂固地继续活在日本。

然而，若将目光转向中国，正如上述中国知识分子针对历史认识问题亦即谢罪问题、教科书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表现出的某种冷淡以及“日中·知识共同体”活动中的思路错位所显现的那样，很显然在认识的层面上正产生着某种隔膜。因日本的“脱亚”而似乎一直被统领着的“亚洲”，曾被视为尾随着自己的“亚洲”，如今却不知不觉地开始引导日本了。日本人关于“脱亚”的认识与现实的“亚洲”之间出现了微妙的错位，并且几乎没有日



本人意识到这种现实中的错位；于是，我们看到了现实与认识上的双重错位。

我想用“中国的冲击”这一名称呈现这种错位并使其问题化。

我们不妨回到问题的出发点试问：我们本来果真能说日本明治时代以后脱离了中华文明圈而转入西欧文明圈了吗？

### 欧化并非“脱亚”

关于文明圈转移的思路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实际上，明治时代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日本与西欧的关系，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变得很紧密了；在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所受到的来自西欧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正因如此，占压倒多数的日本人都以为自己已经属于西欧文明圈了。

但是，在此，我们所不能忘记的一个事实是：在这一个半世纪里，西欧化了的国家不仅仅只有日本。中国虽然在“易服”（服色制度的改变）、历法等方面，即所谓“政教礼俗”上的欧化落后于日本<sup>〔2〕</sup>；但辛亥革命

---

〔2〕 就如山室信一氏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在易服、断发、历法等方面的欧化落后于日本，还处于山室氏所言的“类同”化现象之中。但1949年以后，报纸和官方文书采用横排印刷、历法上采用公历纪年等方面的欧化甚至比日本还彻底。参见山室信一著《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岩波书店2001年版）第二部分第七章。

(1911年)以后,中国也热心地吸纳了西欧文明,在二十世纪的前半叶,虽比日本有所落后,但同日本一样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例如,就社会文化层面而言,在生活习惯、宗教、社会伦理以及家庭关系等方面仍然保留着旧有的东西的同时,服饰、年号、教育制度和教学科目等等都已欧化了。即便是在政治制度上,抑或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对西欧文明的吸纳与日本的欧化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我们以一个世纪为时间单位、用一种较长的历史尺度去衡量的话,中华文明圈本身在是否已经欧化的问题上,其内部虽有浓淡之别,但作为一个整体它已经欧化了;并非唯有日本跑出中华文明圈并实现了欧化。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讲明治时代以后我们在文明方面是欧化了,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声称我们已经走到了中华文明圈的外面来了。再者,如果中华文明圈可以用“顽固不化”、“古风旧习”、“儒教主义”、“虚饰的外表”等词汇加以形容的话,那么,从原则上讲,岂止是日本,中国与韩国也基本上一直在致力于摆脱这些东西,不能说只有我们摆脱了<sup>[3]</sup>。仔细分析一下即可得知:所谓“脱亚”,总而言之仅仅可以归

---

[3] 或许有人会说:不!中国现在不也是“陈旧的专制”、“无视法律的国家”吗?的确,此类现象是存在的。可正是这一点是不可以用价值优劣为标准去评判,而应作为类型之差异加以对待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在此不作展开。不过,在此只想提及一点:所谓的“专制”、“无视法律”是与传统的圣人治世、儒教的道德秩序观相连的,内含着中国传统的德治主义的民主观念和伦理秩序。如果一概以欧洲史脉络里的“专制”、“无视法律”的观念为标准来衡量的话,那将会歪曲事实。

结为一点——也就是比起亚洲的其他国家来，日本的资本主义化早实现了一步。

如上所言，并非只有日本摆脱了中华文明圈，不过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化早实现了一步而已。而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化了的日本迅即进入了西欧文明圈，或已经脱离了中华文明圈了。本来，判断某个民族是生存于某个文明圈的外部还是其里面的思考方法本身，实际上是将文明圈这一观念实体化了。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所谓文明圈，并不是说存在着一个实体性的区域，不过是指称某一种类型的结构关系。若要从实体的角度去观察它的话，那只能去观察被认为属于某个文明圈的民族或国家间的种种个别性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所能看到的或是政治的或经济的关系、或是文化方面的或社会方面的关系。至于说到综合了这些关系而形成的结构，我们仅仅能够抽象出抽象性的意象。如果我们放下抽象概念去考察实际存在的关系——例如明治时代以降的日中关系的话，可以得知它与明治时代以前相比，在许多方面并没有发生变化。就社会文化方面亦即社会风俗、习惯、宗教、生活伦理等方面而言，正如津田左右吉早就指出的那样，日中间的共同点本来就很稀少；在这一点上，明治以前与明治以后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倒是在两国渐行欧化之后，双方使用了相同的西历年号、学校制度和教育科目等等。因此，从这方面来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与中国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相同成分

在欧化以后反倒增加了。

在思想文化关系方面，就日本学术界和思想界里有关中国的评价而言，无论是被肯定还是遭否定，也不管是明的或是暗的，中国始终是作为另一位主角而被赐予一席之地的。这一点在接受了儒学的日本近世自不待言，即使在被认为已转入西欧文明圈的明治时代之后乃至今日也依然如故。准确地说，那并非关注中国使然，而是由于中国作为探讨日本问题时的一个背景装置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日本人常常是以中国为媒介来确立自己的民族认同的。例如，本居宣长的日本主义或吉田松阴的天皇主义就是把中国当作媒介的典型例子。再举一个浅近的例子。当今，大部分的日本人在总结自己的近代化成果时，他们在与“先进的”欧洲进行比较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在与被视为“落后的”中国进行着比较，并从中获得满足。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也充当着日本认识自我的媒介。

也就是说，在确定日本的坐标时，日本人有一种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当作媒介的癖性；明治以前也好，之后也罢，甚至在今天，这种癖性都没有改变。

这里有一个日本人几乎漠然无知却是本该明白的事实：在中国，与上述那种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相当的、中国人对日本的关注，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在近世的中国未曾有过。明治时代以后，虽说有许多中国留学生为学习日本的近代化而东渡日本，但他们主要关心的不在于日本本身，而在于通过日本这个“窗口”所看到的欧洲。在1930年代的日中战争时期，虽然中国对日本的关

注有所高涨，但那只是对战时敌国的一种特殊的关注。而且，到了战后，在日本，竹内好把为了论说日本而产生的对中国的关注打造成了话语；而在中国，与这种程度相类似的关注，除了极少数人以外，至少在当今中国的知识界里是不存在的。中国是有不少日本研究者、日语学习者以及东渡日本的留学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我在此所说的，不是指具体的对日本的关心，而是指抽象性的关注，亦即中国人旨在思考中国问题的对日关注。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国的知识界里几乎找不到日本被当作思考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时的媒介或思想资源而为人所需的事实。

日本关注中国的持久性与中国的对日关注的微弱所形成的思想文化层面上的这种不对称关系，在明治以前也好、之后也罢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仅从上述的少数例子即可得知，所谓“明治以后日本脱离了中华文明圈”的言论若是就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极大变化的角度所讲的话，那它是不切实际的。这里倒是存在一个几乎没有日本人愿意承认但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日本的对华关注与中国的对日关注间的这种不对称关系实际上不外乎是中华文明圈时代以来“中心与边缘”的结构关系的顽强表现而已。

尽管如此，所谓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华文明圈的言论作为大多数日本人的实际感受而得到支持。那是因为，在日本人的主观世界里，以明治维新为界，自己所尊崇的文明在“文明开化”的大合唱中已明白无误地由中华

文明转变为西欧文明了。

## 被颠倒了的优劣

但是，如前所述，作为一个整体，中华文明圈里的国家包括被殖民化的地区都已实现了欧化，虽然在各个不同层面有着快与慢、浓与淡的差异。

那么，为什么日本人不能认识到曾经一向自认所属的文明圈整个地都已实现了欧化，而要固执于“唯有自己从中脱离了出来”的观点呢？一个原因在于日本人拘泥于这样的思考方法：将西欧化即近代化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视为在民族性或历史过程等方面的优劣关系。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样做，对于满足自己（作为亚洲盟主）的民族认同来说极为便利。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最早实现西欧化的优胜者（日本）对落后了的劣者（中国）的构图；在确立民族认同时，把自己定位于亚洲的优等生；这种构图与定位因其通俗易懂甚至在日本的一般民众中都得到了普及。但它却因通俗易懂而被简单化、形式化了。其结果是，它隐蔽了一些事实。

首先，它隐蔽了这样一个历史实情：日中两国的西欧化即近代化过程所显现的时间上的先后之差实际上反映了两者的近代化过程的类型之别（请参照本书第7章《两种近代化道路——日本与中国》）。

其次，由于采用了一种两分法将日本和中国分别划

入西欧化世界与中华世界，如上所述两者间历史上持续存在的不变的共通性——不相同的共通性——关系也被隐蔽了。

就类型之别而言，有这么一个例子。福泽谕吉写《脱亚论》是1885年的事。而在中国，张德彝或斌椿等人早在此前的1866年就已介绍了欧美的议会制度；1875年，身处政府中枢的军机大臣文祥也曾就议会制上奏说：“（使其行之不易）依理言之，亦应采纳”，等等；中国很早就开始转向接受欧美政治制度的方向，绝非还在顽固不化地贪于酣睡。不过，两千多年王朝体制本身的崩溃过程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因而向欧化的转换不如日本那么身轻易动，而是足足花了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的前期阶段亦是与日本和西欧类型相异的、由中央集权体制转向地方分权体制（各省独立运动）的过程，而从其传统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文化的土壤特性来看，比起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竞争原理）来，社会主义则更有亲和力（参照本书第三部分），等等。由于这样一些原因，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一进程显得缓慢。而当时的福泽谕吉，却没有能力看到历史的这种复杂的本质性差异。

问题在于历史观。近几年我很关心日中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我关注的方式是与他人不同的。一般人说起日中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主要是把有关日中战争的历史认识作为问题；而在我这里，我想探讨的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历史观的问题，亦即我们该用怎样的历史眼光去

把握包括日中战争时期在内的、十六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的日中关系或东亚关系？（关于这一点，容待本书第二部分详述）

## 导致空洞化的力学

比如说，在日中之间发生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考验我们的历史认识的、现在进行时的问题：即日本企业将工厂转移到中国的问题。

试以日本的测绘机械和光学机器行业的现状为例。这一行业存在着三大制造商，其产品直到 1980 年代末还在世界上受到市场的欢迎。说起它们的现状，现在，这 3 家制造商将大约 60% 以上的机器委托给中国的制造商生产或与之合资生产，而其在日本国内的工厂则迫不得已地或关闭或缩小。事情不仅如此。2004 年元旦还有早报报道说：中国制造（包括合资生产）的乘用车开始打入先进国家的汽车市场。据说 2003 年中国的汽车产量是 350 万辆、居世界第 4 位，在 2004 年里将超越世界第 3 位——德国的 400 万辆。与上面提到的中国的光学机器的技术精度已被认可，并已达到了与市场相应的水准一样，中国生产的汽车的技术精度想必也得到了认可。在日本消费者的注意力还集中于大量从中国进口的农作物和服装等生活用品时，在仅仅几年的时间里，打入市场的中国制造的商晶已经由光学机器、家用电器终于扩展到了汽车产业。

问题在于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历史眼光去看待这样的



现状。若用“西欧文明圈的日本”对“中华文明圈的中国”之类“脱亚论”的优劣逻辑去认识的话，就会把问题理解为：“中国很穷，工资又低，所以才利用中国人来制造”。这样的理解在1980年代的日本曾经很流行。但是，现在的状况并不是能轻而易举地用这样的说法解释得清楚的。日本国营广播公司NHK2001年末针对日本1000家中小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苦于日本经济的不景气。问其理由，有62%的公司回答说是因为客户要求降低产品价格，33%的公司回答说是由于海外涌入日本的产品冲击着自己的市场。根据我的推测，这62%的公司所面临的降价要求，其中大部分是为了对抗海外产品。这么说来，加上上述的33%，则有95%的日本中小企业都苦于海外产品的直接或间接的涌入。而所谓海外产品，其大部分是在亚洲新兴工业经济区以及中国大陆生产的“日本产品”。这样的状况在2004年的今天也基本上没有改变。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关志雄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的价格下降对于企业而言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这将作为一种促进生产规模与扩大就业的力量而起作用”（《夺走日本就业机会的不是中国》，载《世界》2002年1月号）。仅从光学机器行业的角度看，这种看法作为对现状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如前所述，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日本光学机器行业原先在亚洲新兴工业经济区的韩国、中国台湾等国或地区的产品生产基地被迅速地转移到了中国大陆。据我的实际感受推测，今后十年之内，日本这个行业在海外